

谁的城

一段

正在消逝

的记忆



著

谁的城

正在消逝
的记忆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记忆 / 贾冬婷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02-51040-6

I. ①谁… II. ①贾… III. ①城市建筑—研究—中国 IV. ①TU9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0893号

责任编辑：徐 颖

封面设计：罗 洪

装帧设计：谢晓翠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 × 210mm 印 张：9.375 插页：6 字 数：212千字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9.00 元

| 自序 |

仔细想想，这本书里所记录的都是关于城市的记忆碎片，而这些记忆所依附的物质载体，大都已经消失了。

过去的十几年，正是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十几年。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成为全世界的工地和秀场，明星建筑师和明星建筑轮番登场，以摧枯拉朽之势构筑出“乌托邦”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变化的时间维度被极度压缩了，也因此显得更加剧烈。

这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作为一个记者，我有幸坐在前排，见证了这个时代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壮举，见证了舞台中央空降的城市新地标，见证了拆迁和保护的激烈冲突——这些都是最好的魔幻现实题材。只是，在这些大拆大建的背后，有什么被我们忽视了呢？是随着物质载体的变迁而消逝的记忆。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所描述的，“记忆的潮水继续涌流，城市像海绵一般把它吸干而膨胀起来。描述今天的采拉，应该包含采拉的整个过去；然而这城不会泄露它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来，写在街角、在窗格子里、在楼梯的扶手上、在避雷针的天线上、在旗杆上，每个环节依次呈现抓花的痕迹、刻凿的痕迹、涂鸦的痕迹。”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小学毕业后的暑假，当时的北京还没那么多环，我和爸妈站在王府井，看到旅游地图上一个附近的地名，“金鱼胡同”，一定要去看看。因为在我心里，“胡同”和“北京”是画等号的，这么一条在市中心被标注的胡同，一定是最能代表北京的。到了却发现，金鱼胡同早已是一条繁华的大街，“胡同”之名只是一个残存的身份标记，在那里已经找不到任何有关“胡同”的记忆了。直到 2005 年，我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去采访前门附近即将被拆迁的胡同居民时，才续上了这份戛然而止的“胡同”情结。我还记得，在兴隆街 177 号，赵更俊和妻子将红红的山楂一切两半，用小刀将中间的核细细剔除的情景。“每天早晨躺在床上就能听见奏国歌，穿过几条胡同，就是前门和天安门广场了。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对面第一笼包子的热气就飘出来，还有炸芝麻烧饼、麻花圈、薄脆、豆浆、豆腐脑、油条，赶着上学和上班的人都聚拢来了……”在窗下的柔和光影里，赵更俊慢慢悠悠地对我讲述着这个他祖辈生活的小院和胡同的故事，仿佛这一切还会不紧不慢地继续下去。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之后不久，一条扩宽至 25 米的马路就将从院子中间穿过，一半房屋都会被拆除。我不知道赵更俊家后来搬去了哪里，但一直记得他讲述的故事。而十年之后，人们去前门地区找寻的，也不是宽广的前门大街，而是大街周边残存的胡同，因为那里面才有更多赵更俊的故事，才有这个城市特有的记忆。

一个建筑师朋友曾对我说起他的困惑，关于城市的归属感。他重视人的城市体验，尤其在一些公共建筑中，精心设计了人的空间体验。但他发现，无论是项目业主，还是城市居民，都似乎

更在乎建筑是否让人眼前一亮，好不好用在其次，更遑论公共性。一个原因是，作为城市事件主体的“人”长期被忽略，他们对城市建设长期丧失知情权和参与权，这种被动逐渐变成了根深蒂固的麻木。谁的城市？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本书的主角，正是城市里的人。书中的文章都来自2005年至今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城市领域的报道，由一系列“城市事件”引发，背后则是事件中的人和他们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才是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才是一个城市的归属感所在。

我时常想起有一次去西安采访，站在城墙上，就好像置身一个隔绝了车水马龙的古代城市。不禁想象北京城墙若是不拆，会不会如梁思成当初设想的场景：“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或铺些草地，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城楼角楼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话，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西安规划局原局长韩骥对我强调了城墙保护背后的情感因素，他曾经去佛罗伦萨考察古城，专门拜访了当地最重要的保护组织，“我们美丽的家园”，原来会长正是美第奇家族的后人，说古城保护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因为保护古城就是保护祖先留下来的财产，其次的保护力量才是有利益关系的商人和民众。我想，如果这些城市报道能在某一时刻唤起人们的情感记忆和保护意识，

也就是它们最大的价值所在。

感谢这本书里的采访对象，是他们的讲述搭建起了这座记忆之城；感谢《三联生活周刊》的同事们，这些文章里有他们的智慧和协作；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是他们为这些文章赋予了新的意义；感谢我的爱人、父母和孩子，他们陪伴和见证了我的写作，也是他们，让这些文字变得情感丰沛，有血有肉。

| 目录 |

01 城市与记忆 001

故宫最后的工匠 003

样式雷：中国古建筑世家背影 018

失去胡同的前门大街 027

寻找失去的恭王府 038

外滩：重回“公共客厅” 051

石库门的身份重建 069

02 城市与人 081

西安城墙与西安人：情感的守护 083

土楼里的宗族流变 102

“世遗”西递：乡村的终结？ 124

站起来的城中村？ 140

上海，张爱玲与郑苹如的命运交叉 155

从异乡到异乡：重访萧红漂泊地 169

03 城市与再生 199

白塔寺再生：胡同小院的生存与生活 201

震区未来：建筑师的想象与实践 219

后工业时代的大工厂 235

生态城，改变的种子？ 246

地下“异托邦”，共享空间的可能性 258

到西河去：乡愁与愁乡 273



01

城市与记忆

故宫最后的工匠

故宫大修自 2002 年起，将持续至 2020 年。对历经 900 年风雨的这座皇家宫殿的修缮，并不比整座重建的工程量小。厚厚的宫墙将社会和技术的更迭隔绝，大修的每一个环节——选材、工艺、工匠——都力求遵循传统。这套“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包括“瓦木土石扎，油漆彩画糊”八大作，其下还细分了上百个工种。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下，官式古建筑从材料、用色到做法，都要严格遵循营造则例，代表最高等级的紫禁城无疑是登峰造极之作。于是，故宫的修缮也成了一种仪式，成了传统的一部分——建立在这座伟大的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回想故宫初建，自永乐四年（1406 年）开始，备料和现场施



慈宁宫修缮工地

工持续了13年，动用了10万工匠，数十万劳役。这一代的修缮，很多方面只能从史料上重现当年的辉煌。比如选材：“殿内铺用澄泥极细的金砖，是苏州制造的；殿基用的精砖是临清烧造的；石灰来自易州；石料有盘山艾叶青；西山大石窝汉白玉等；琉璃瓦料在三家店制造。这些都是照例的供应。照得楠杉大木，产在湖广川贵等处，差官采办，非四五年不得到京。”

相关工艺也在变异甚至消失。曾主管大修的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晋宏逵表示，曾经的“八大作”都随着现代社会需求的萎缩而萎缩。“比如搭材作，过去用木材，现在用钢管了。过去用麻绳捆，现在改螺丝了。裱糊作，过去老百姓都要裱糊房子的时候，这个工种很发达，现在即便故宫里，也少有这一行当了。”

随工艺凋零的，当然还有工匠。《考工记》中记载着2000年前的手工艺，其中有匠人之职，属于营国修缮的工种，所谓“国有六职，百工居一”。封建社会灭亡后，古建筑营造的传统制度断裂了。故宫似乎是个特例，经年不断的修缮为传统工匠和工艺的传承提供了温室般的小社会。

故宫的修缮中心位于故宫外西路的未开放区建筑群中，仍保持着它在功能上的历史延续——在清代，它曾作为造办处，为皇家制造生活器具。按晋宏逵的要求，修缮中心有三大任务，一是大修工程；二是碎修保养（相当于故宫的物业）；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营造技艺和工匠的传承。“修故宫是门手艺，靠师傅的口传心授，徒弟的‘筋劲儿’。”修缮中心主任李永革形容。

修缮中心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故宫的三次大规模维修。1952

年成立的“故宫工程队”，就是修缮中心的前身。战乱时垃圾遍地、杂草丛生，国将不国，哪顾得上修故宫？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次大修的首要任务是清理垃圾，然后才是修缮整理。李永革原本是军人，1975年复原来到故宫，当时故宫有个解说词，形容1912年到1952年有多乱，说是“从故宫清理出的垃圾，如果修一条2米宽，1米高的路，可以从北京修到天津”。

谁来修故宫呢？一开始是从外面招人，每天早晨来上工，在门口发一个竹签，晚上干完活，大工给2块工钱，小工给1块，把签交还。如果干得不错，工头会说“明儿再来”，如果不好，“您别来了”。靠的是一种松散的管理。当时的故宫古建部主任是单士元先生，他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把一些在北京各大营造厂的“台柱子”召集到故宫，让他们带着徒弟一起来，发固定薪水，冬天“扣锅”时也上班，做模型，为开春挖瓦做准备。这些人在传统的“瓦木土石扎，油漆彩画糊”八大作中都有代表，当年号称故宫“十老”。这些顶尖高手是故宫修缮中心的第一代工匠，也是故宫古建传承的根。

第一代匠人大多走的是旧式传承之路——商号带徒弟。说起来，这些商号也与故宫有紧密的关联，清末各木厂、油漆局、冥衣铺、石厂大都集中在鼓楼西大街附近，东至东直门，西至甘水桥，延续了五六华里。这一位置离故宫神武门不远，属闲杂人等出入的门，正是为了方便去故宫接工程。在民间和宫里的双重实践中，他们练成了手艺。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传承大多靠第一代工匠的口传心

授。第二代传人有木作的赵崇茂、翁克良，瓦作的朴学林，彩画作的张德才、王仲杰，现在已七八十岁了，大多身体不好或已去世。

“文化大革命”期间，师徒传承中断了。李永革 1975 年来故宫时，在大木作当了七八年学徒，但已经不兴磕头拜师、“封建迷信那一套”了，讲究“革命同志式的关怀”。当时“十老”中还有人健在，但也八九十岁了。李永革跟着赵崇茂师傅，但没磕头，没鞠躬，没有师徒名义。

李永革这批第三代工匠，来自故宫工程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招聘。20 世纪 70 年代，故宫给国务院打报告“五到七年规划”，耗资 1400 万元，得以进行第二次大修，招收了 457 名技术工人。那个年代工作不好找，故宫在市中心，也是个事业单位，是不错的出路。李永革家住鼓楼附近，骑自行车 10 分钟就能到故宫，“离家近，是一宝”。何况木工是一门技术，故宫的木工无疑是这门手艺中水平最高的。

到 2000 年以后，第三代工匠也已经过了 50 岁，却不知把手艺传授给谁。李永革在修缮中心恢复了古建八大作中最重要的“铁三角”——木、瓦、彩画的传统“拜师会”：徒弟毕恭毕敬行三拜礼，送拜师礼，师傅们端坐椅上回赠收徒帖，一旁是引师、证师。他认为，古建传承还得靠师傅带徒弟。比如用作木建筑保护层的“地仗”，配方包含着岩石颜料、桐油、米浆、兽血等古老材料，尽管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但春夏秋冬、何种木材、下不下雨，比例都不同，个中奥秘只有那些几十年经验的老工匠才能掌握。“就像老中医开药，药方不同。”



杨志和徒弟范
俊杰在慈宁宫
钉望板

“储上木以待良工”

据传统，宫殿安装大梁时必须择吉时焚香行礼。清代重修太和殿时，因是金銮殿，康熙皇帝要亲自主持梁木入榫典礼。不巧，大梁因榫卯不合悬而不下，典礼无法进行，这对皇帝是大不敬之事。工部官员急中生智，让木作工匠雷发达穿上官衣，带上工具，如猿猴般攀上脚手架，斧落榫合，上梁成功。康熙帝龙颜大悦，当面授予他工部营造所长班之职，后人编出“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微照命，金殿封官”的韵语。这未必是史实，但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木结构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大木作的哲匠良工也是往往代表着一代营造匠人。翁克良就是大木作第二代工匠的代表。

自从1952年来故宫“问道”开始，翁克良在故宫一待就是50年，参与了“宫里”几乎所有大殿的大木维修。最让他自豪的，是修

四大角楼：1951年西北角楼、1959年东北角楼、1981年东南角楼、1984年西南角楼。前两个角楼都是老前辈带着修的，修后两个角楼时，翁克良已经是木工组组长了，能亲自主持大木修缮。

“一般人说是9梁18柱72条脊，其实比这还要复杂，上下三层，有20根柱子、28个出角、16个窝角。”虽然维修角楼时不慎被切断一截手指，他说也值得：“角楼是故宫木结构中最复杂的。还有谁能参与全部四个角楼的修缮？”

作为官式木建筑的顶峰之作，故宫主要采用中国北方地区大量使用的“抬梁式”大木结构体系。以木材制作柱、梁、斗拱、檩、椽等主要承重构件，由相互垂直的椽、檩承托上部屋面荷载，通过梁架与斗拱传递到木柱，最后将全部荷载传递到基础。

一座宫殿所用的木料和它的体量大致相当。明代修故宫非常奢侈，大殿常用金丝楠木，木纹中隐含金丝，在阳光照射下闪烁华美。入清以后，由于缺乏楠木，转而大量使用黄松。甚至乾隆皇帝为自己特别修建的颐和轩，也只是采用了红松做柱外包楠木的办法。据翁克良观察，如今故宫中已经没有完整的楠木殿，楠木使用较多的也只有南薰殿一处。再到后来，足够大的红松亦属难得，因此大量使用木料包镶拼接技术，太和殿内那些直径1.5米、高13米的“金龙柱”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拼合而成的。现在市场上最好的就是大小兴安岭的红松，但也所剩无几，大口径木材开始从东南亚进口了。

大修中遵循“最小干预”和“减少扰动”的原则，木结构尽量不更换。有些木构件局部糟朽，失去承载能力，通常采取局部

剔补方式处理。将糟朽部分剔除干净，用干燥旧木料按原式样、尺寸补配整齐。现在也在局部加入了新材料和工艺，如周圈剔补时，加铁箍一至两道，行话叫“穿铁鞋”。

在翁克良看来，最难的并不是重搭繁复的角楼，而是“抽梁换柱”——整体框架不动，把三面开口的柱子抽掉再安装。这就要在起重架抽取前，先在柱子上打号，记载它的角度，以确保安装后丝毫不差地回到原位。“大木号”的做法古已有之，比如某根抽掉的柱子上记载“明间、东移缝、前檐柱、向北”，清楚标明位置，还有工匠的签名，类似一种责任制。

翁克良的手艺是在故宫外学成的。16岁时，母亲就托人给他找了个师傅学木工手艺，就是刮、砍、凿、刺四项基本功。师傅叫侯宽，在营造厂做事。“当时拜师都要举行仪式。先得给木匠行的祖师爷鲁班上供，磕仨头，之后再给师傅磕仨头，还要给师傅送礼。做了徒弟之后，每年的年节也要给师傅送礼。师傅收徒都是一拨一拨的，也不会给人开小灶，徒弟们都给师傅打下手，自己靠悟性跟着学。当徒弟讲究‘三勤’，就是眼勤、手勤、腿勤，做不好就得挨师傅打，有时正干着活呢，刚一走神，师傅在后头随手拎起个木板就给屁股来一下。”翁克良学徒那时候，木工手艺一般是“三年零一节”出师，就是满三年之后，再逢一个年节日，这手艺就算学成了。

现在不像以前，不是师傅不愿教，而是徒弟不愿学了。20世纪70年代，故宫木工组收了30多个徒弟，翁克良带过的也有不少，现在大多数都已改行或离开故宫了。如今故宫里又恢复了传